

中东冲突下中国—亚细安经济整合新逻辑

顾清扬

中东的持续动荡已不再是局部冲突，而成为撬动全球经济结构重塑的关键变量。与以往的能源危机不同，本轮冲突的核心影响，不止于供给收缩或油价波动，而在于能源、金融与供应链机制的政治化重构。当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能源咽喉被纳入地缘博弈框架，能源价格不再单纯由市场决定，而逐步被安全风险所锚定。全球经济由此进入一个以地缘政治为主导的新周期。

这一变化带来三重深远影响。其一，全球供应链逻辑正在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关键资源、航道与技术节点被重新定义为战略资产，区域化与多元化成为主导趋势。

其二，能源武器化正在侵蚀美元体系的稳定基础，推动多元货币结算体系的形成，全球金融结构呈现出由单极向多极演化的迹象。其三，通货膨胀与增长之间的政策张力显著上升，各国在货币政策上面临更为复杂的权衡，全球资本流动与增长预期均将受到抑制。可以说，世界经济正从全球化红利驱动转向安全风险定价。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经济的战略重心也在发生深刻转变。高质量发展不再仅是效率与创新问题，地缘政治正逐步成为重要的约束条件，并将塑造以安全为边界、以技术与产业体系为核心的新发展范式。能源安全压力将倒逼中国加速绿色转型，在光伏、风电与新能源汽车等领域，进一步巩固全球领先地位。同时，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现实窗口，中国有望通过能源贸易与区域结算体系的重构，提升人民币在跨境交易中的使用比例。

更重要的是，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与供给能力，使它从世界工厂逐步转型为系统稳定器。在外

亚细安既是经济整合的关键平台，也是大国战略博弈的前沿地带。这种“经济整合—安全竞争”的张力，意味着区域经济安全本身也将被地缘政治所内生化。如何在竞争性安全环境中维持合作预期、构建战略互信，将成为决定中国—亚细安经济整合能否真正形成的关键变量。

部冲击加剧时，这种稳定供给能力本身即构成一种稀缺的全球公共产品。

这意味着，中国在新一轮全球重构中的角色，不仅是参与者，更可能成为规则与稳定性的提供者。

如果将视角进一步聚焦到中国与亚细安，此轮冲突也许会推动双方关系发生质的跃迁：从过去以成本分工为基础的互补型合作，转向以经济安全与韧性为导向的共生型体系。能源价格上升与运输不确定性，使亚细安国家面临更直接的通胀压力与供应链风险，也促使它更加重视区域内部的稳定供给与协同能力。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亚细安的合作可能呈现出四个结构性深化方向：第一，能源合作从单向供给转向体系共建，包括区域电网、可再生能源投资及技术转移；第二，货币合作从边缘工具走向核心机制，人民币在贸易与投资中的使用将逐步提升；第三，产业链关系从“转移”走向“嵌入”，形成更紧密的区域生产网络；第四，基础设施与物流体系加速一体化，构建更具抗冲击能力的区域循环体系。

这意味着，中国与亚细安将逐步从自由贸易区走向抗冲击共同体。驱动这一整合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比较优势，而是面对不确定性冲击时的经济生存理性。在极端情况下，区域内部能否维持基本生产与供应循环，正在成为新的核心命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重构过程也将显著提升亚

细安的战略地位。随着全球供应链向区域化转型，亚细安有可能从原有的生产节点，升级为连接中国与全球南方的重要枢纽。中国制造与资本的外溢，将推动亚细安工业化进程，同时也加深双方在价值链中的相互依赖。这种依赖并非单向，而是一种基于风险分担与能力互补的结构性绑定。

在这一新的区域格局中，新加坡的角色尤为关键。短期来看，能源与航运波动将对传统港口与转运功能带来冲击，但从中长期看，枢纽地位并不会削弱，反而将发生功能性升级。新加坡正在从效率型中转港转型为风险管理型枢纽，核心价值不再是单纯的物流通道，而是供应链调度、金融结算与风险定价能力。

在金融领域，新加坡有望成为人民币与美元体系之间的重要“接口”。在区域内人民币使用上升的背景下，新加坡成熟的金融体系与法治环境，具备充当双货币稳定器的条件，既承接人民币结算需求，又维持与美元体系的深度连接，强化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在产业层面，凭借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与多边协定网络，新加坡能够为中国企业进入亚细安提供制度缓冲与风险管理。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在区域分工中的附加值，也在大国博弈中维持相对中立与可信的战略定位。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无论这场中东冲突后续如何演变，它都加速一个长期趋势的明朗化：全球经济正从以效率为导向的全球化体系，转向以经济安

全为约束的区域化体系。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与亚细安有可能率先构建一个具有内生稳定性的区域经济循环系统，通过能源、金融、产业与基础设施的深度协同，形成相对独立且具韧性的亚洲内循环。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在区域中的角色，将进一步演进为风险对冲者与系统稳定器；而亚细安则从被动嵌入全球体系的节点，转变为主动塑造区域格局的关键力量；新加坡则在其中承担连接、协调与定价的功能性枢纽。

这场冲突发生在中东，但深远影响正在重塑亚洲的经济逻辑。对中国与亚细安而言，这既是外部冲击，更是一次重构区域发展模式的历史性契机。

然而，这一以经济安全为导向的区域整合逻辑，并不会在真空中推进，而是始终嵌入复杂的地缘政治结构之中。亚细安既是经济整合的关键平台，也是大国战略博弈的前沿地带。南中国海争议的存在，以及美国在区域内持续的介入，使得由经济理性驱动的合作进程，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不确定性的扰动。这种“经济整合—安全竞争”的张力，意味着区域经济安全本身也将被地缘政治所内生化。因此，如何在竞争性安全环境中维持合作预期、构建战略互信，将成为决定中国—亚细安经济整合能否真正形成的关键变量。

当前的危机也许是一个好时机，让本区域的经济整合成为加强各国政治互信的催化剂。事实上，过去是有成功范例的，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不久之前的冠病疫情冲击，都使得中国与亚细安经济更加整合和政治互信更加加强。当前的危机也许提供另一次区域深化合作的机遇。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原载《商业时报》